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3.003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小玺,郑澜,张耀军.新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人口综合红利:特征、逻辑与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7-69.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3.003.



Citation Format: Wang Xiaoxi, Zheng Lan, Zhang Yaojun.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haracteristics, logic, and path[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2): 57-69.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6.03.003.

新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人口综合红利:特征、逻辑与路径

王小玺¹, 郑澜¹, 张耀军²

(1. 莆田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2.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是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重要前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是审视人口综合红利的全新视角。从内涵特征看,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理论是在发展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对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的延伸和拓展,立足于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进程,以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人口条件为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通过政策措施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培育、巩固和收获人口优势,推动人口与经济系统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为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基础和支撑,其基础是“人口”,关键是“综合”,核心在“红利”,具有系统性、阶段性、统一性的特征。从内在逻辑看,人口的总量规模、年龄结构、综合素质、空间分布等是人口综合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前依然存在人口综合红利释放的现实阻碍,但应立足于人口与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利用人口现有优势和人口转变机遇,充分发挥人口因素在助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立足当下人口负增长的现实,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人口条件,也要放眼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挖掘、培育人口结构优化红利、人口素质提升红利和人口合理分布红利,以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完善为路径,引导人口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需求,积极回应人口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通过进一步完善生育养老政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优化城镇格局体系,以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人口综合红利;高质量发展;人口政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24.2;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2-0057-13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的多维人口结构红利研究”(FJ2023MGCA037);莆田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新型人口红利的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2023010)

作者简介:王小玺,莆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耀军(通信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zhaoyajunruc@126.com。

引言

纵观人口学与经济学的的发展历程,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控引导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扩大就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助推了经济快速增长^[1-2]。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总抚养比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被称为人口红利^[3]。这一概念自从被提出之后,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使用。然而,由于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状态,较高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并不是一种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人口状态。2010年,我国15~64周岁人口比重在达到峰值后转入下降阶段,2023年仅为68.3%,相比2010年的74.5%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相应的,人口总抚养比由2010年的34.2%持续增长至2023年的46.5%,人口总量也于2022年正式步入负增长时代(图1)。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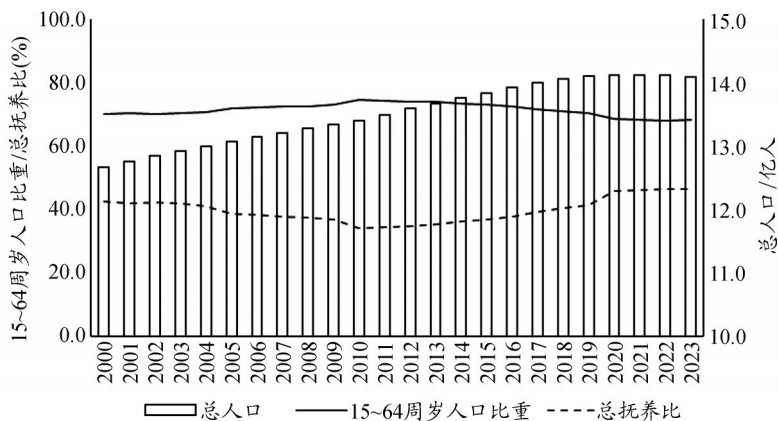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3年我国总人口、15-64周岁人口比重及总抚养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向^[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6],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其中人口发展状态的变化则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方面需要从客观上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指导经济发展方向和评价经济发展状态的“标尺”,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主观上将新发展理念作为塑造经济发展基础和优化经济发展条件的“指针”。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和关键变量^[7-8]。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关于人口红利的学术讨论和社会关注愈发热烈,如何从人口这一最基础最能动的要素出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基于经济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这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9]。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需要具有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学术支撑,既要遵

循人口与经济的基本规律,也要紧密结合我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充分发挥人口经济政策的调控引导作用,以挖掘利用和培育塑造人口综合红利为路径,助推人口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新发展理念视角下,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具体国情,深刻理解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丰富内涵和主要特征,准确把握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明确人口红利的挖掘、培育和利用路径,积极回应关于人口红利的学术争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体系、促进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传统人口红利概念的演进与局限

西方学者 David Bloom 等人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率先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用来描述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所形成的经济增长优势以及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3]。此后,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研究,成为理解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2004年,我国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引入国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收获了潜在的人口红利^[1]。尽管在人口红利的测算和期限等方面存在观点争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自发的,而是人口结构条件和经济增长方式相互适应的结果,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10-13]。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总抚养比也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方向性变化,引发了对于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人口的大规模集聚流动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成为解释后人口转变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15-16]。人口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有利条件推动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逐渐进入延伸阶段和拓展阶段,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征^[17]。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依然被视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一些学者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指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投资深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并据此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18-20];另一方面,性别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等其他人口条件被纳入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性别红利^[21]、长寿红利^[22]、人口质量红利^[15]、配置型人口红利^[23]等广义人口红利概念相继被提出,从不同角度阐释人口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回顾已有研究,尽管对人口红利的概念阐释在不断丰富变化,但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视域上依然存在偏差,部分核心议题需要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阐释。第一,研究的碎片化、片面化削弱了人口红利理论的解释力度。人口发展不仅包括总量、结构的演进变动,也包含素质、分布的优化调整,并且人口影响经济的渠道路径是多元的,这意味着同一时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犹如硬币的两面。若只关注其中一面而忽视人口的整体影响,简单地用过去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或人口负债来表征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利于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准确把握。第二,在价值层面过度强调人口的工具属性而忽视人口的目的属性。在传统人口红利研究中,人口通常被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因素,政策应用则把人口单纯看作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工具,缺乏更深层次的价值探讨,很少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着眼于经济的数量增长。究其原因,人口红利作为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在本土化的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和滞后性,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目标要求尚缺乏及时的、必要

的、深入的互动和对话。

(二)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内涵

与传统和广义的人口红利概念相比,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虽然同样强调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但在理论内涵和政策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体现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见表1)。

在理论内涵方面,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基于人口转变理论中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化,主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然而特定人口转变阶段产生的这一暂时性优势在理论层面是不可持续的,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对老龄化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极大弱化。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则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从结构、质量、分布等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人口红利概念,强调人口可以通过推动资本深化、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等间接机制和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综合红利理论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新发展理念,关注全人口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强调不同人口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补位效应和协同效应,在价值层面强调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具属性与目的属性相统一。

在政策实践方面,传统人口红利研究聚焦于经济起飞阶段,强调劳动力数量投入在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策导向通常落脚于改善制度与交通条件以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与就业。广义人口红利聚焦于经济转型阶段,为适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需求,主张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管理,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上升以及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人口综合红利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新发展理念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需求,在注重教育建设和流动人口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投资于人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政策,包括儿童发展、女性就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兼顾人口高质量发展。

表1 传统人口红利、广义人口红利与人口综合红利的理论与实践演进

		传统人口红利	广义人口红利	人口综合红利
理论内涵	理论基础	人口转变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高质量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
	作用机制	直接贡献	间接机制	协同效应
	理论视角	单一、单向	多元、单向	多元、双向
	价值导向	人口工具属性	人口工具属性	工具与目的属性相统一
政策实践	发展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	经济转型阶段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	劳动密集型产业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知识密集型产业
	政策工具	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与就业	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强劳动力跨区域管理	“投资于人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政策
	核心目标	经济规模增长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经济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综上,人口综合红利是对传统人口红利概念的衔接、延伸和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既是一种条件、状态,也是目标、旨归,其基础是“人口”,关键是“综合”,核心在“红利”。从组成看,人口综合红利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素质红利和人口分布红利。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应该放在我国人口与经济历史性“双重转变”的背景下来认识,放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来理解,放在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来把握。概括起来,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指的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进程中,以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人口条件为基

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通过政策措施的适应性调整培育、巩固和收获人口优势,推动人口与经济系统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为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基础和支撑。

(三)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主要特征

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不仅局限于人口或经济本身,还包含着人口与经济的内部外部、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兼具独特性和复杂性。根据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规律,结合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具体国情,可以归纳出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鲜明特征。

1. 系统性

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既关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本身,也强调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从人口系统看,尽管人口规模转向负增长,但人口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人口流动交往日益频繁。2000年至2023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由5.9万人增长至101.5万人,并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2023年同比增长超过15万人;人口城镇化率则由36.22%增长至66.16%,增长近30个百分点;2023年的城镇人口达到93 267万人,相较2022年新增近1 200万人(见图2)。人口数量规模的增减变化、年龄性别结构演变、劳动素质的提升改善和空间格局的流动变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直接决定着人口综合红利的基础。从经济系统看,既包括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也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存在广泛的联动、叠加效应,影响着人口综合红利的兑现和收获。从两者的关系看,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以生产力要素的形式参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同时,经济活动也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服务于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性意义所在^[24]。除此之外,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的发展演变也会对人口与经济产生传导效应,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理解人口综合红利的庞大系统。因此,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不是简单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系统的、综合的存在,应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视野将人口、经济以及其他系统的要素和环境联系起来,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系统内部均衡和系统外部协调的有机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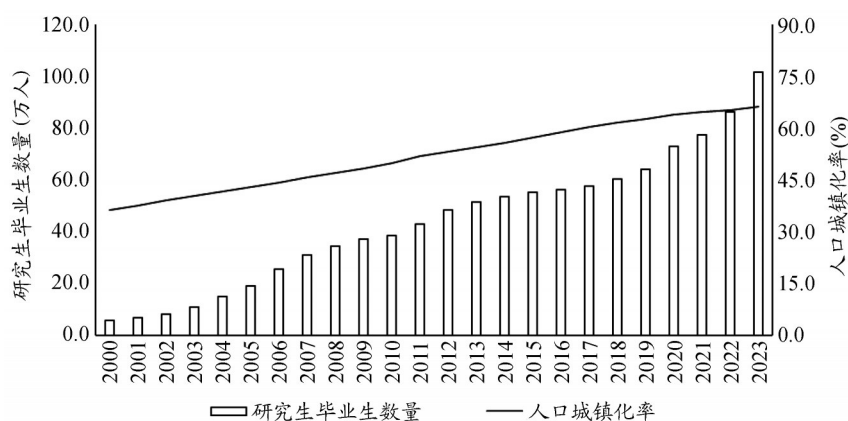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3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及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2. 阶段性

人口转变理论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通常滞后于死亡率,使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随之提高,这是

收获传统人口红利的基础^[14]。根据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到走向成熟阶段,从大众消费阶段再到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不同阶段的条件要求和主要目标存在显著差异^[25]。从发展实际看,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经历了深刻的阶段性变化。以第二产业为例,第二产业比重在2011年至2016年经历了快速下降阶段,之后逐步稳定在38%~39%的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同样呈现出“增→降→稳”的阶段性变化,在2012年达到30.4%的峰值后,逐渐下降并稳定在28%~29%的水平(见图3)。人口与经济的阶段性变化是理解人口红利的现实基础,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阐发于我国人口与经济两者均跨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同时在发展基础、研究理念和价值追求上意味着对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的更新和超越。当然,阶段性通常也意味着动态性和时效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条件基础是动态变化的。当人口步入负增长阶段后,人口综合红利的主导因素将由原先的数量结构因素过渡转换为质量配置因素;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目标由注重数量增长转为数量质量并重,佐以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将有效收获人口综合红利。如果忽视了人口与经济的阶段性转变,将会浪费这一“人口机会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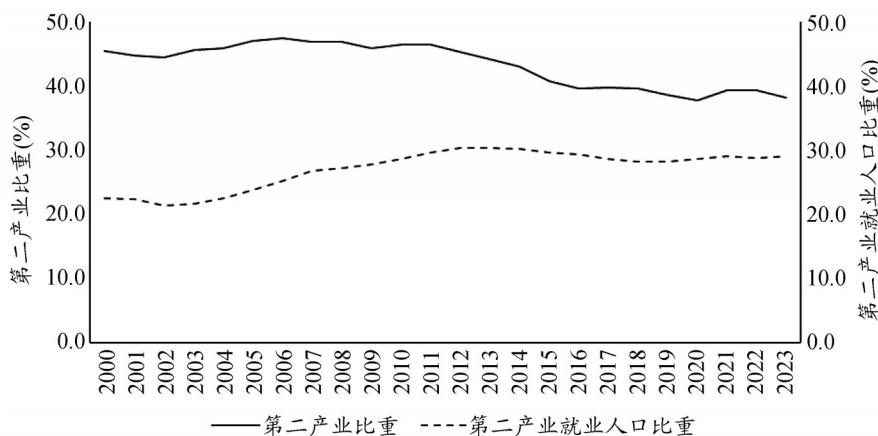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及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3. 统一性

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是理解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重要理论纽带和中介,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统一。一方面,红利的产生离不开人口,人口是红利的基础,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立足现有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目标,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发挥现有人口条件的潜力和优势,发挥积极作用,抑制不利影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发展过程中对现有人口条件进行优化塑造,通过政策调节人口再生产、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力配置,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人口综合红利注重发展稳态与动态的辩证统一。人口综合红利强调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不是绝对的静止的状态,而是相对当前阶段的发展条件和目标而言,能够达到的人口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相对稳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稳态会发生变化,人口综合红利从本质上就是构建、打破、再构建稳态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上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

二、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近年来,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成因和影响日趋复杂,经济发展先后遭遇了外部封锁打压和世纪疫情的不利影响,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日渐增多。贯彻新发展理念是适应发展形势、破解发展困境、开创发展新局的必然要求和金石之策,同时也是利用和重塑人口综合红利、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立足于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可以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阐明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探讨制约人口综合红利释放的现实阻碍,为推动新时代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提供事实基础和理论支撑。

(一)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人口是创新的主体因素。纵观人类的创新发展史,无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与人口密切相关^[26]。我国人口发展为推动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催生的创新。尽管我国人口转入负增长阶段,但2024年年末的人口总量依然高达14.08亿人^①,人口规模巨大为创新发展提供了难以复制的规模优势^[27]。巨大的经济市场可以培育出规模大且互相竞争的企业,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也刺激企业作出创新反应,频繁的经济活动也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二是人才总量增长带来的创新。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口群体,也是支撑创新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各类人才资源总量不断增加,研发人员总量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人才比例的进一步提升将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推动各领域的变革创新^[24]。三是人口流动集聚带来的创新。2024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45亿人次^[28],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①,人口流动集聚伴随着资金、技术、信息、思想等生产要素的交流组合和优化配置,有助于增强创新力。

(二)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协调发展

不平衡的发展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实现协调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人的协调发展,需要发挥人口因素在缩小差距、促进收敛、推动协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是人口素质提升有助于缩小人的发展差距。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单元和能动主体,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推动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得到优化改善,健康素质、知识素质和数字素质等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个人能力发挥和价值实现的机会更加均等,为缩小发展差距奠定了基础。二是人口流动迁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持续流动不仅推动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大再生产,而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29]。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仍在迅速发展,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加之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发展的差距将会逐渐收敛。三是绿色行业就业人口增长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协调。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绿色行业就业人口规模快速增长。据统计,2019年我国城市绿色就业总数已超过4500万人^[30],为推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经济发展、实现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人口基础。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三)人口综合红利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既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发展适应并推动了绿色发展。一是人力资本深化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污染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创新型人才凭借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开展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从而推动绿色发展^[31]。二是人口素质提升有助于推动绿色消费。绿色发展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在经济消费活动中,受到人口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不同的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群体更易于接受绿色消费观念并开展绿色消费活动。随着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实现绿色发展具备了更加坚实的人口基础。三是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传统的低效率企业将会被高效率企业所替代,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深刻调整,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医疗、康养、旅游等低排放行业快速发展,成为绿色经济新的增长点^[32]。

(四)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开放发展

坚持对外开放是顺应全球化潮流、推动我国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除了经济贸易的往来、思想文化的碰撞,人口的交流交往也是开放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大规模人口交往推动开放发展。2024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6.1亿人次,同比增长43.9%,其中外国人6488.2万人次,同比增长82.9%^[33]。人口跨境交往不仅促进了文化上的相互了解,而且也有助于推动餐饮、住宿、交通等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二是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开放发展。高素质人口通常具有更开放的思想 and 眼界,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开放、融入开放、推动开放,在开放发展中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留学生群体是高素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留学人数快速增长,2022年达到105.2万人,比2021年增长1.3%^[34],留学人员回流为推动教育开放和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三是人口老龄化推动开放发展。2024年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2亿人,占全国人口15.6%^②,庞大的老年群体推动消费市场供给的精细化,通过吸收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医疗康养、出境旅游等养老产业,推动养老服务开放合作,促进银发经济繁荣。

(五)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不仅注重“利由人创”,而且也强调“利由人享”,推动实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属性与目的属性的统一。一是人口流动迁移推动发展成果跨区域共享。人口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迁移本身就是追求美好生活、享用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并且作为资金、经验、技术、文化的载体,人口的反向流动也有助于推动发展成果的扩散,使落后地区在此过程中受益。二是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发展成果跨阶层共享。投资教育、提升学历是中低收入群体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弱势阶层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推动共享教育发展成果^[35]。此外,高素质人口通常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道德修养,也是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共享发展的必要条件。三是年龄结构转变推动发展成果跨代际共享。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财富积累、精神情感、健康状态、生活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代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际差异通常会导致隔膜或分歧,但如果按照代际共融共享的理念,在家庭支持、老年照护、青少年发展、就业指导等方面促进代际互补支持,有助于资源整合和共享发展^[36]。

综上,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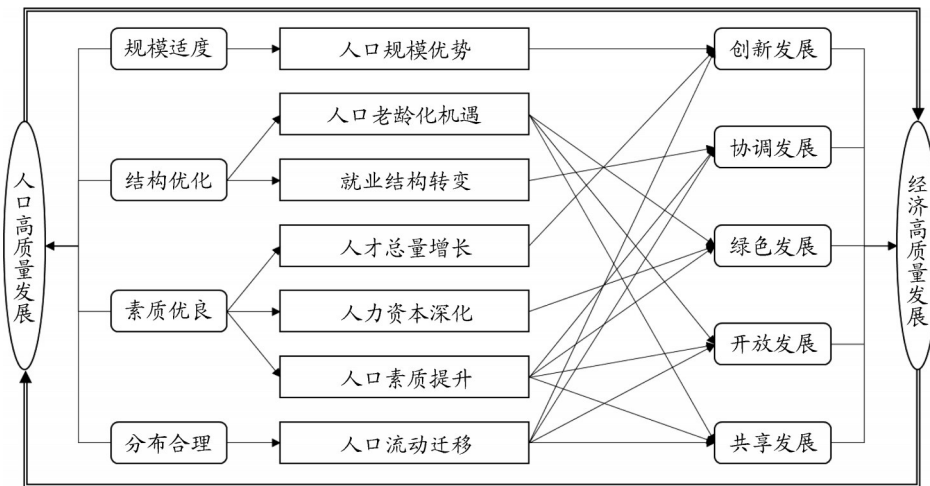


图4 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发展现状和趋势看,我国人口依然存在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助推高质量发展,通过合适的人口经济政策可以持续收获人口综合红利。然而,我国人口也面临着诸多内部挑战和外部约束,对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压力超过机遇。根据预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在未来十年将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在2034年将突破4亿人次^[37]。虽然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有助于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但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也会提升劳动、资本等要素成本,并且挤压科技研发投入,从而对创新发展产生抑制效应^[38]。第二,人口教育素质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劣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学学历及以上人口在25~64周岁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8.54%,与加拿大(59.84%)、日本(54.02%)、美国(50.05%)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③。此外,我国科研人才规模结构与后备人才培养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利因素,限制了人口素质红利的作用发挥^[39]。第三,人口流动集聚的负面效应较为突出。一方面,高素质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集聚不均衡,造成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削弱了地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40]。另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无序集聚造成了大城市病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41-43],对区域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人口综合红利的实践路径

人口发展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与行动实践^[44],人口综合红利的收获同样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政策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立足当下人口负增长的现实,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人口条件,也要放眼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挖掘、培育人口结构优化红利、人口素质提升红利和人口合理分布红利,以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完善为路径,引导人口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需求,积极回应人口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以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③ 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 <https://www.oecd.org/en/data/indicators/population-with-tertiary-education.html>。

(一)完善生育养老政策,收获人口结构优化红利

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合理的年龄结构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针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一方面要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削弱人口快速下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挖掘老年人口的经济潜能,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发新的人口年龄红利,推动人口与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人口规模适度充裕。进一步完善保险、补贴、休假等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精准性,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及多子女家庭在教育、医疗、就业、户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24]。大力发展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衔接性,鼓励用人单位针对新手父母设置弹性工作岗位。推动婚育习俗改革,倡导育儿责任家庭共担,营造尊重生育价值的社会文化氛围。

二是落实渐进式退休政策,缓解劳动力缩减的压力。开发顾问指导、家政服务、护理照料等劳动强度较低、适合低龄老人的工作岗位,加强针对低龄老人再就业的技能培训和社会融入,让更多具备工作能力且有意愿继续参加社会劳动的老人实现老年价值。同时,进一步完善老年就业人口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通过签订用工合同、强制保险覆盖等方式,既降低企业用工风险,又能激发老年人力资源潜力。

三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挖掘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潜力,结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结合数字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养老、医疗、康养、文娱等产业集群。拓展养老服务与产品供给,发展养老服务师、长期照护师等新工种和新职业,开发关联就业岗位,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多样化、智慧化水平^[45]。

(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收获人口素质提升红利

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培育人力资源、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是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和科学素养,激发劳动力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推动劳动力质量数量替代。更加注重教育公平,促进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畅通区域间人才交流交往机制,以“内育+外引”的模式提高优秀高素质人口的比重,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

二是立足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结合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双碳”目标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发布关键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和紧缺程度清单,引导高校重构跨学科课程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大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三是完善政策制度支撑,深化高水平教育开放合作。立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需求,加强同世界顶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促进教育领域的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特色教育走向国门,围绕跨文化沟通教育和前沿科技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开放型国际化人才。进一步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优化海外人才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参与我国高质量发展。

(三)优化城镇格局体系,收获人口合理分布红利

人口跨区域和跨城乡的迁移流动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刺激消费,带来集聚效应。通过进一步扩大就业、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以分布合理的人口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扩大就业进一步提升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水平。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构建差异化、互补式的人口集聚导向。在城市群和都市圈,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在中小城市和县域,重点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吸引本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持续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重点解决养老托育、就业服务等方面的短板问题,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二是通过交通建设和制度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继续推动铁路网和公路网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提供交通便利。聚焦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痛点,深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地供给改革,推行以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记录为主要依据的公共服务获取机制,充分保障流动人口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住房租赁等方面的平等权益。

三是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最大化发挥人口集聚优势。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契机,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空间格局,探索跨区域的税收分享、用地指标交易等机制,促进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集聚。针对人口收缩城市,重点围绕盘活存量空间、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实施精明收缩策略,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重点镇街有序集聚,实现高质量、小而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2004(2): 2-9.
- [2] 原新,高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人口红利[J]. 人口研究,2018(6):3-14.
- [3] 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419-455.
- [4] 陆杰华,谷俞辰. 优化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现实内涵、核心议题与实践路径[J]. 社会科学辑刊,2023(4):134-144.
- [5] 顾海良. 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1):1-7.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7] 王金营.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未来人口发展的取与舍[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4): 145-154, 238,241.
- [8] 何雄浪,王诗语. 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与城市经济韧性[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 46-62.
- [9] 习近平.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 奋斗,2024(22): 4-8.
- [10] 蔡昉. 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J]. 经济研究,2022(10):4-9.
- [11] 侯东民.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 人口研究,2011(3):29-40.
- [12] 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5-13.
- [13] 王广州,刘旭阳.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变化历程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2):64-78.
- [14]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4-13.
- [15] 黄凡,段成荣.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22(1): 117-126.

- [16] 张耀军,李佳林. 人口红利: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J]. 区域经济评论,2025(3):34-45.
- [17] 陆杰华,谷俞辰.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4):1-13.
- [18] 王树. “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理论渊源、作用机制与数值模拟[J]. 人口研究,2021(1):82-97.
- [19] Mason A, Lee R, Jiang J X. Demographic dividends, human capital, and saving[J].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2016,7:106-122.
- [20] Cai 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J]. China & World Economy,2020,28(5):26-44.
- [21] 蒋莱. 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82-89.
- [22] 原新,王丽晶. 中国长寿红利:人口机会、政策环境与开发方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2):57-63.
- [23] 金牛.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N]. 中国人口报,2021-07-26(03).
- [24] 石智雷,彭锐城,王璋.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83-96.
- [25] 魏志奇. 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的启示[J]. 理论月刊,2014(12):113-115.
- [26] 朱函葳. 基于人口转型现实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的探索:统一增长理论视角[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7-56.
- [27] 梁建章,黄文政. 人口是提升创新力的重要因素[J]. 中国经济周刊,2018(29):84-85.
- [28] 新华社. 2024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45亿人次[EB/OL]. (2024-12-23)[2025-06-05].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2/content_6994178.htm.
- [29] 李勇. 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J]. 当代经济科学,2016(4):98-106,127-128.
- [30] 《2021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发布-就业-中工网[EB/OL]. [2025-10-08]. <https://www.worker.cn/c/2021-12-20/6935789.shtml>.
- [31] 王珊珊,张勇,纪韶.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7):79-96.
- [32] 孙玉阳,郭涛. 人口老龄化会抑制绿色经济增长吗[J]. 人口与发展,2023(4):113-121.
- [33] 曾诗阳. 2024年6.1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43.9%;政策升级拓展交流交融[N]. 经济日报,2025-01-15(03).
- [34] 欧美同学会,全球化智库.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M/OL]. [2025-06-05].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http://www.ccg.org.cn/archives/89440>.
- [35] 张学敏,周杰. 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46-156.
- [36] 李俏. 老龄社会,需倡导“代际共融”[EB/OL]. [2025-01-22]. <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C03KmSVUkM>.
- [37] 杜鹃,李龙.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96-109.
- [38] 李飏,仇勇. 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创新: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3-160.
- [39] 秦琳,姜晓燕,张永军. 国际比较视野下我国参与全球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形势、问题与对策[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8):12-23.
- [40] 杨波,王天歌,李子璇,等. 中国科研人员国内流动态势及演进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4(12):2567-2577.
- [41] 邱勃,袁晓玲,王书蓓. 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典型机制与差异化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21(3):94-106.
- [42] 沈洁,张可云. 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20(1):1-12.
- [43] 吕有金,高波.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41-51.
- [44] 朱荟. 以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人口发展战略新格局[J]. 社会科学辑刊,2023(4):155-164.
- [45] 杨菊华,刘轶锋. 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银发经济繁荣: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97-109.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haracteristics, logic, and path

Wang Xiaoxi¹, Zheng Lan¹, Zhang Yaojun²

(1. School of Marxism,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P. R. China; 2.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issu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new era is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or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re concepts and value pursuit. It is based on China's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akes popul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size, structure, quality and distribution as the foundation, and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rough adaptive adjustment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 demographic advantages can be cultivated, consolidated and reaped, promoting the internal balance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laying a solid demographic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systematic, phased and unified, and its foundation is population, the key is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core is dividends. From internal logic, the total size, age structur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obstacles to the release of demographic advantages, we can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population factor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f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realize the current reality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fully tap and utilize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conditions, but also look to the future trend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explore and cultivate the demographic advantages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We should take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systems as the path to guid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so a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oals and task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further improving policies on childbirth and elderly car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urban pattern syste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an be realized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policy;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傅旭东)